

血与火的记录熔铸不朽史诗

洪 树

数字背后 牺牲之重与信念之坚

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中付出了巨大牺牲：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从江西出发时约8.6万人，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时仅剩约7000人；最惨烈的湘江战役中，红军在广西全州、兴安、灌阳一带与数倍于己的敌军血战五昼夜，渡江后锐减至3万余人；红八军团由1.1万人减至1000余人；红三十四师担任后卫，几乎全部牺牲……

《红军长征记》对湘江战役及此后行军的记述，不是单纯渲染惨烈，而是通过亲历者笔触写出行军、战斗、救护、渡江的日常。老山界是长征中所过的第一个难走的山，有些地段只能沿70多度陡壁上凿出的石阶攀爬，侧面是数十丈深的悬崖。这些细节让人意识到，长征的牺牲远不止于战斗减员——冻死、饿死、坠崖、掉队后失踪……这些“非战斗减员”在书中以近乎平静的笔调被记录下来。这些细节让人明白，巨大牺牲不仅是统计意义上的减员，更是每一天的坚持、每一程的互助。长征胜利来之不易，正是无数红军将士以生命为代价，才换来了革命转危为安。

流动学校 长征路上的干部团

长征中的干部团是一支具有特殊职能的队伍。它由中央苏区红军学校合并而成，陈赓担任团长，宋任穷担任政委。它既是精锐战斗队，又是流动学校，担负作战、后勤、群众工作等多重职能，为各部队储备、培训和输送干部。书中《由金沙江到大渡河》《从金沙江到大渡河》等篇，记录了干部团许多鲜为人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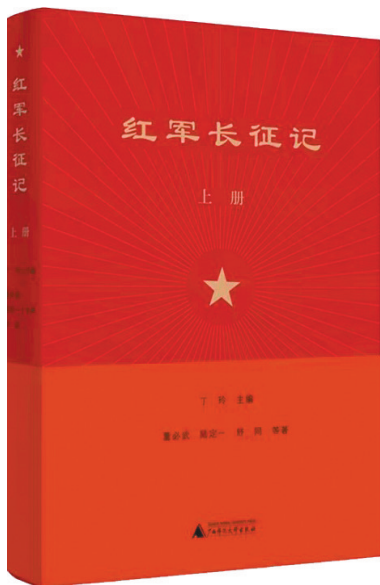
关于长征的浩繁书写中，《红军长征记》有着特殊的分量。它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最早、最真实、最具文化特色的纪实文学作品之一，1937年2月由丁玲主编完成，收录了董必武、陆定一等百余位长征亲历者的回忆文章。其底本是朱德亲笔签名赠给埃德加·斯诺的孤本，斯诺回国后捐赠给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后经影印版底本回到中文世界整理出版。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重读这部书，既是回到历史现场，也是从原始记录中理解长征精神何以穿越时空。

人知的故事。

智取皎平渡是干部团的经典战例。红一、三军团分别在龙街渡、洪门渡尝试渡江失败后，中革军委把唯一突破口交给干部团。刘伯承率领先遣部队昼夜急行100余里，深夜突袭皎平渡北岸厘金卡，缴获全部渡船，控制渡口。随后，干部团翻越山路，抢占通安州山头隘口，击溃援敌，守住渡口后方屏障，保障中央纵队和全军渡江，甩开数十万追敌。大渡河沿线，干部团归刘伯承、聂荣臻指挥，沿西岸牵制敌军，配合红四团飞夺泸定桥。

在川西高原，干部团承担芦花运粮任务，翻雪山、冒风雨，为前线部队送青稞、牛羊；在打鼓地区，坚持政治动员和群众工作。干部团建立的初衷，是保存骨干、储备干部，实践证明，这所“流动学校”为长征胜利提供了重要组织保障。



民族融合 如何化隔阂为信任

长征经过苗、瑶、壮、彝、藏、回等少数民族聚居区。红一方面军长征371天，其中132天行进在民族地区。由于历史原因，民族隔阂严重，加上国民党反动宣传，红军初入民族地区时困难重重。书中收录了多篇记录民族地区经历的篇目，《广西瑶民》记述红军进入瑶族地区时的谨慎与尊重，《“保保”投军》则记录了彝族青年加入红军的场景。红军总政治部专门发布了关于瑶苗民族工作的原则指示，要求严格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习俗。在广西龙胜龙坪，红军扑救民房大火，保护鼓楼，这座鼓楼后来被群众称为“红军楼”。在四川彝区，刘伯承与小叶丹在彝海结盟，使红军能迅速通过。

正是这些看似琐碎的实践，使红军在

民族地区从“外来的汉人军队”变成了可以被信任的力量，打破了长久以来的对立与隔阂，为党的民族政策形成积累了宝贵经验。长征不仅是军事转移，也是党的民族政策的重要实践期。

绝境光亮 长征精神可感可触

伟大长征精神不是抽象口号，在《红军长征记》中，它具体可感。杨成武攻打腊子口时写下“事到万难须放胆”，在悬崖峭壁、敌军据险死守面前，这句话就是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谢觉哉在《抱桐岗的一夜》中写暴雨露营，大家挤在一起取暖，干粮淋成稀糊，仍互相让食。舒同在《芦花运粮》中写运粮队翻雪山、冒风雨，为危在旦夕的部队送口粮。《飞夺泸定桥》《一个人带一根绳》等篇，则展现红军在自然恶劣、粮草短缺、敌军围堵等多重困境中，患难与共、同舟共济。

这些片段让人意识到，长征精神的“可感”不在于它多么崇高，而在于它在最艰险的处境中依然散发光亮。饥饿、寒冷、疲惫、恐惧——这些都是真实的，红军在这些真实困境面前的选择也是真实的。《红军长征记》中令人震撼的或许不是“他们做到了什么”，而是他们在那种条件下依然保持了豪迈的气魄。分享最后一点粮食，在雪山上开玩笑，在悬崖边互相拉一把……这些细节让长征精神变得可触可感，在绝境中保持信念，在困难中互相扶持，在未知中勇往直前。

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重读《红军长征记》，不是简单复述历史，而是从亲历者笔触中汲取初心力量，一种未经修饰的、在场的、带着泥土和雪水气息的真实。正是这种真实，让长征从一段被反复讲述的历史，重新变成可以被感受的动人力量。

鲁迅周作人决裂后的联系

顾 农

鲁迅、周作人兄弟在1923年7月决裂以后不再来往，但也还有些曲折的联系、暗通的信息。先前舒芜先生总结过四条：其一，通过第三者向对方有所询问；其二，第三者将一方的书信给另一方看；其三，第三者将一方的情况告诉另一方；其四，鲁迅、周作人两边宾客相互交流。（《周作人的是非功过》，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增订本）这四条讲得当然很对，后来颇有转述者。

在这里，还需补充两条：一是在可以公开发表的讲演、谈话中涉及对方。例如1932年周作人在辅仁大学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其中说起八股文的朗读问题，就提到鲁迅在《朝花夕拾》中说到三味书屋里教书的老先生读书时摇头摆脑的神

情；又如，1934年夏天周作人在日本接受采访时多次说起鲁迅——

问：先生的《域外小说集》开了介绍外国文学的先河。据说那时候还没有白话体，是使用古文忠实地进行翻译。

答：是的。那是和家兄一起翻译的。第一集印了500本，结果只卖出去10本，实在可怜。出乎意料的是现在反而畅销。现在那本书由上海的群益书社出版了第一集和第二集。

再如，周作人在接见日本改造社来访者的谈话中也多次提到鲁迅。

鲁迅也曾经多次说起周作人，其中最著名的是，1936年5月他回答美国友人斯诺的问题时，给予周作人散文以很高的评价。

二是在某些文字中，含蓄地流露

了怀念往昔的手足之情。例如，1934年鲁迅得到两种残缺不全的《点石斋画报》，重新装订为六册，并于首册扉页作题记——

《淞隐漫录》十二卷。

原附上海《点石斋画报》印行，后有汇印本，即改称《后聊斋志异》。此尚是好事者从画报析出者，颇不易覩。戊年盛夏，陆续得二残本，并合为一部存之。

九月三日南窗记。

这份题记后来被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看似同周作人无关，其实不然。后来周作人写过一篇关于《淞隐漫录》的文章，特别提到：“我初次看见此书在戊戌春日。”又说：“强因此类著作，尚有《遁庵谏言》与《淞滨琐话》各

十二卷，平日见之亦不甚珍重，今之特别提出《漫录》，实以有花牌楼之背景在耳，而转眼已是四十四年，书味亦已变质，他更不足论矣。”（《书房一角·旧书回想记·〈淞隐漫录〉》）

所谓“花牌楼之背景”，即指他早年在杭州陪伴祖父时，曾从大哥鲁迅那里得到过小开本的《淞隐漫录》四本。《周作人日记》戊戌（1898年）正月廿八日载：“下午豫亭兄偕章庆至，收到《壶天录》四本、《读史探骊录》五本、《淞隐漫录》四本、《阅微草堂笔记》六本。”豫亭兄就是豫才兄，亦即大哥鲁迅。

鲁迅周作人兄弟后来那样珍重《淞隐漫录》一书，都别有隐情，只是彼此都不肯说破罢了。

跨越时空的精神丰碑

张家鸿

■提示

以地点和时间为线索，穿越时空，红军小战士在行军途中给新时代少年“写信”。12封来信，把长征路上的所见所闻一一告诉收信人；收到信后，新时代少年给红军小战士“回信”，12封回信，把伟大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深情地告诉革命先辈。

红军小战士来信告诉曾经的浴血奋战与九死一生，新时代少年回信告知如今的幸福美满与繁荣昌盛。从艰苦奋斗到静夜美好，从现实困境到诗意仰望，徐鲁的《从雪山到星辰》是直面历史现实的温故之书，也是走向美好未来的希望之书。

不就是接过英雄传下来的精神衣钵，并融入内心化作实践的斗志吗？

书信开头的称谓中，“亲爱的”三个字值得细细品味。是怎样的写信人与收信人，才能在开头如此称呼对方？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是相濡以沫的挚友？还是勠力同心、生死相随的同胞？可以说，《从雪山到星辰》让人读后热血沸腾，与“亲爱的”三个字有关。长征途中，红军指挥员的平均年龄不到25岁，战斗员的平均年龄不到20岁。有多少英雄，在十几岁的时候生命戛然而止，把全部奉献给祖国与人民？这样的英雄，称得上伟大。这是一部让人浮想联翩的书信集。



“来信”与“回信”之间跨越近百年光阴，这是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自主的百年，是中华民族不懈拼搏、可歌可泣的百年，是炎黄子孙从被列强欺凌、忍辱负重到挺起胸膛、大踏步向前的百年。

如果没有先辈们的不懈奋斗，哪有新时代少年回信的安逸时光？信里哪有祖国美好、民族强大、人民安康的喜讯告知？

书信可以穿越百年光阴，精神可以

传承百年乃至更辽远、漫长的光阴。徐鲁笔端拉开的是一条长长的时间线，在过去与当下之间往返不断。诚如他在《喜看稻菽千重浪》中所写：“如今硝烟散尽，忠魂长眠，红军视死如归、勇往直前的故事……一直传颂在湘江两岸，成为照亮后人、激励奋进的不灭火焰和强大精神力量。”

新时代，伟大长征精神有着更加丰富的崭新定义。余梓洋的外曾祖父谢桂标曾是一名红军战士。每个周末，余梓洋都会穿上小红军军装，在当年红军战斗过、生活过的地方，为游客讲解红军往事、红军精神。北师大硕士毕业的黄文秀，到广西乐业县百坭村担任驻村党组织“第一书记”，在这里，她从具体的小事、实事做起。为邀请班统茂大叔带领大家种植砂糖橘，一次次往山里跑，直至打动对方。新时代里，黄文秀是脱贫长征路上的“女红军”。

两万五千里长征已经结束，民族自立、国家自强的长征还在路上。对当下国人来讲，长征是一段必须牢记的历史，伟大长征精神是可以不断汲取的财富。

这部书信集之所以厚重、深刻，正在于它通过亲历者娓娓道来的口吻，以讲故事的形式展示，在未来的日子里，伟大长征精神是灯塔，是照亮前行的路。它不仅在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的日子里闪耀着，更闪耀在每一个普通人的寻常日子里。

书市观澜

档案文献活化 成长征主题出版亮点

姚雪痕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长征主题图书迎来集中出版热潮。

据估算，今年长征主题图书（含新书与再版）总量为160种至220种。在结构分布上，通史与纪实文学类占35%；史料文献汇编类占20%；青少年读物增长明显，占20%；理论研究类占12%；画册、连环画等艺术图像类占13%。多元品类构成完整产品矩阵，兼顾学术典藏、大众阅读与青少年德育等不同需求。

各地出版社协同发力，在创作中坚守历史底线、学术底色，通过档案比对、实地田野采风夯实基础，做到政治性、学术性与可读性统一。同时，出版界采取分层受众策略，面向党政干部、研究者、普通读者与青少年群体开发不同形态读物。创作上，深度挖掘长征精神的当代价值，对接“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时代命题，阐释长征精神在新征程中的现实启示，推动红色历史经验转化为当代精神资源。

内容层面上，从宏大史实考据转向历史阐释与价值挖掘并重。原始档案与亲历文献的深度活化成为亮点，馆藏一手史料被大量整理出版，亲历者回忆录影印本、战地报刊、书信、口述史料陆续面世，还原历史现场。作品中纳入普通战士、红小鬼、少数民族群众、后方妇女等个体故事，以微观细节增强文字感染力。党史军史前沿学术成果加快向大众读物转化，以扎实史料支撑通俗表达，摆脱刻板说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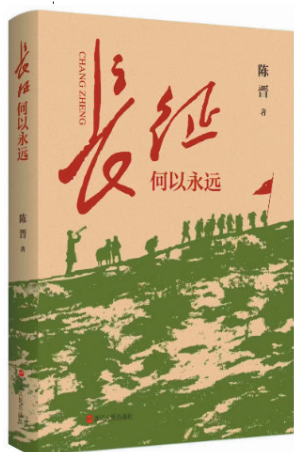
出版形态上，纸质书与融媒体深度融合成为行业共识。融媒体图书大量问世，配套有声书、微纪录片、历史地图、AR战场复原，打造沉浸式阅读体验。同步布局数字渠道，电子书、有声专辑上线，依托短视频平台拆解厚重著作，制作轻量化故事片段回应青年群体需求。配合纪念馆巡展、线下读书会开展传播活动，部分选题尝试浸改、剧本等衍生开发，拓展红色文化传播边界。

在传播方式上，宣发模式从传统图书销售转向场景化阅读推广。多地新华书店设立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专区，国家图书馆联合江西、甘肃等地文旅部门发起，全国各级各类公共图书馆共同承办，推出“跟着长征读懂中国”红色阅读推广系列活动；各地开展新书首发、学术研讨、长征沿线巡讲活动，将出版物嵌入党史学习教育、主题党日等场景。

同时，提升国际传播意识，部分精品图书同步规划多语种版本，面向海外发行。例如，新世界出版社推出“长征，让世界读懂中国”系列主题活动，发布《苦难与信仰：最后的红军长征亲历者口述史》多语种版本，面向海外讲述长征亲历者的真实记忆。系列丛书不再只是单本零散输出，而是集群打包出海，在国际书展上集中展示，让海外读者读懂长征蕴含的信念力量，把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推向全球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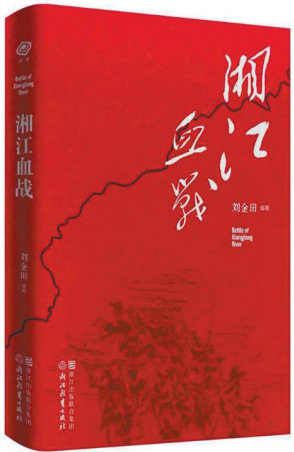
今年的长征主题出版守正创新，一手激活红色文献存量资源，一手打造新时代原创作品，兼顾史实严谨性、叙事丰富性、媒介多元性。这套多层次、全媒体的出版体系，既完成了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的文化任务，也持续释放出长征精神的时代力量。

■荐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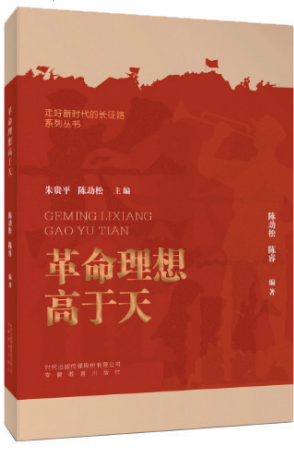
《长征何以永远》
浙江人民出版社

全书跳出单纯史实复述，从命运转折、征途传奇、精神高地、北上会师等维度切入，还原长征中的关键抉择与人物故事。作品紧扣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命题，阐释长征精神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启示，回答“长征何以永远”这一时代之问，适合想了解长征精神内涵，又希望阅读体验更生动的读者。



《湘江血战》
浙江教育出版社

聚焦长征途中这场惨烈的关键战役，依托扎实的档案考证与田野调研，还原湘江战役的战场细节与历史原貌。作品跳出宏大叙事框架，兼顾战役推演、红军将士的抉择，再现红军浴血突围的悲壮历程，兼具历史严谨性与文学感染力，帮助读者读懂长征精神淬炼的艰难过程。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丛书
安徽教育出版社

丛书共5册，以小故事阐释大精神，回望红军长征艰苦征程，诠释坚定理想信念、不怕牺牲等长征精神五大内核。作品打通历史与现实，以伟大长征精神对当下的启示，引导读者理解新征程的时代内涵，是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的一套兼具思想性与可读性的通俗理论读本。